



中國銀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百年中銀 与您同行  
A CENTURY OF SERVICES, ALWAYS WITH YOU

## 杰出的国际金融家郑铁如

把毕生精力和才智献给中国金融事业的郑铁如，在中国银行工作逾四十年，是蜚声海内外的杰出的国际金融家。中国银行同仁亲切地尊称他为「铁老」。

### 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铁老字寿仁，广东潮阳县人，生于 1887 年。辛亥革命前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后留学美国，先后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会计和国际汇兑专业。1917 年回国，曾任著名实业家张謇的秘书、北京大学教授。1921 年进中国银行工作。1927 年出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1965 年底以 78 岁高龄退休，任职时间长达 38 年。1973 年在香港逝世，享年 86 岁。

铁老是银行家，更是一位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民外受侵略、内遭战乱的危急存亡之秋。每当风云变幻的时刻，铁老总是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投身于革命洪流。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辍学，参加了沈定一组织的学生军。1919 年，他与马叙伦等被推为北大教职员会代表，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32 年，在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军挑起的「一·二八」事变中，他在香港筹集大量资金物资声援十九路军抗日。「七·七」抗战开始，他又在香港大力推销爱国公债支持全民抗日，成为后来日本占领军拘捕他的「罪证」之一。1938 年，宋庆龄、何香凝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妇女慰劳会」。铁老参加了「大同盟」工作，他的夫人谢纫瑜担任了「慰劳会」司库，夫妇共同为保卫祖国和为八路军筹集捐款而尽心竭力。

1941 年香港沦陷后，铁老与梅兰芳等爱国人士被拘于告罗士打酒店。日本占领军要挟铁老出任伪职，他大义凛然，严辞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香港中国银行部分员工情绪不安，要求发给遣散费自动离行。铁老苦口婆心，谆谆劝导，终于使全体员工安下心来，坚守岗位。

铁老热爱祖国，热爱中行。1950 年 1 月，在海外中国银行接受新中国领导，回归祖国的过程中起到表率作用。1950 年 1 月 6 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愿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 月 9 日，周恩来总理对驻港机构发布命令，要求各机构员工「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不让反动分子有任何偷窃、破毁、转移、隐匿等情事。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其有偷窃、破毁、转移、隐匿等情者必予究办。」

护产命令到达香港，金融机构中首先通电拥护的就是以郑铁如为经理的香港中国银行。郑铁如带头接受新中国领导，不仅使香港中资机构的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为众多海外分行陆续回归祖国

树立了榜样。

### 「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外汇银行」

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纷纷到中国设行。从 1845 年到 1949 年的 104 年间，来华设行的多达 68 家，其中有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沙俄的道胜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发行钞票，操纵进出口贸易，甚至连中国货币的对外汇价也长期由汇丰银行制订公布。铁老在任北大教授时，认识到中国要改变这一情况，一定要有自己的外汇银行，并愿意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当他的意向为当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知道后，就请他到中国银行工作。

1921 年 7 月，爱国情深的铁老，辞去北大教授职务，担任中国银行汕头支行行长。从此，他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为把中国银行发展成为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而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智。在汕头支行工作期间，他不仅开拓了中国银行业务，也为当地金融管理方面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在铁老的建议和多方活动下，终于废除了七兑票。1927 年 1 月，铁老从汕头支行调任汉口分行副行长，同年 7 月，升任香港分行行长。从此，他就把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简称「港中行」）作为开展国际金融事业的基地，他的名字几乎就是港中行的同义词。

经过铁老从 1927 年到 1950 年初接受新中国领导的二十多年的经营，港中行职工从 26 人增加到 90 多人，积存的自有资金高达 6,000 多万港元，成为中国银行开展国际金融业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行。巨额外汇资金引起了台湾当局的觊觎。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派出以俞鸿钧为首的秘密代表团到港，向港中行的主管人员进行游说拉拢，企图利诱一些人连人带资投奔台湾。当时，铁老对港中行的大量资金早已作了安排，以一半资金购置了盖大楼的地皮、建材和设备，连出租给客户的保险箱都以现金办妥订货手续；以大部分资金贷放给香港纺织工业和其他工厂。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台湾当局的劫夺。为了拒绝台湾当局的游说和预防暴力劫夺，铁老称病住进医院，拒不见客，以示决绝，终于为新中国保住了一笔可观的外汇资金。

铁老在开展港中行业务时，积极提倡国货运动，并以大量资金支持在港的民族工业。1947 年，他同时担任广州、香港两地的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的董事长。在联营公司结束后，由铁老担任董事长的香港中国国货公司不仅继续营业，而且有了很大发展。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香港百货业中，仍占一定地位。几家国货公司成为一些离国去乡几十年的海外老华侨踏进国门之前得先观看流连一番的地方。在提倡国货的同时，铁老对来自内地的民族工业，特别是来自上海的纱厂，在资金上给予了巨大支持。铁老对于纺织工业在香港发展的前景，从经济上、生产技术上、销售市场和政治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最后才决定给予贷款。

### 外汇业务奇才

铁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国际金融专家，而且是外汇业务的行家里手。他在担任港中行经理期间，运用丰富的经验，以及对国际形势的深邃洞察，外汇交易上获利颇丰。以下是两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例。

香港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强迫港中行开门复业。铁老对日军说，复业就得支付存款，我们没有钱支付。日军说，没有钱可以借给你们。你们有抵押品吗？铁老就把一位客户逾期没有赎回的房地产做抵押，向日本正金银行借到军票 200 万元，但存户大多已去外地，军票不能用来支付存款，日军就

按 1 元军票合 4 元港币的比率，付给中行 800 万港元。到日本投降前夕，市面上军票不断贬值，1 元港币已可换到 5 元多军票。铁老抓住时机，同香港中国国货公司（铁老是该公司董事长）商量，卖掉公司的一部分货物，将所得军票借给港中行还债，中行则按军票 4 元折换港币 1 元的比率归还国货公司所借给的军票。这样就只用几十万元港币还清了正金银行 200 万元军票的债务，净赚了 700 多万港币。铁老后来笑着对人说，我们大厦的地皮可说是日本人付的钱。

作为一个外汇业务专家，铁老养成了按时收听重要广播的好习惯。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天他收听伦敦广播时，听到英国财政大臣宣布，如果大战不能避免，政府将征收私人持有的外汇和美国股票。铁老凭籍其多年积累的外汇市场经验，立即意识到大战爆发已似箭在弦，如果英国征收私人外汇，英镑势必暴跌，美元势必狂升，很可能从 1 英镑折 4.6 美元跌到折 4 美元以下。他立即打电报到纽约抛出英镑，又在伦敦和香港买进了 300 多万美元。结果在他买进美元没几天，英国果真宣布征收私人外汇，于是英镑一下子跌到每英镑合 3.6 美元。那些卖出大量美元的银行经理到那时才明白中国银行大量买进美元的原因。在这次外汇买卖中，铁老替中行赚到了盖新厦所需的大部分资金——700 多万港元。

铁老能够很好地保全资金不受损失，在于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善于从政局变幻中窥测到外汇市场的动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铁老看出日本军阀的狼子野心，为安全计，他把港中行全部资金调存英美两国。由于事前采取了防范措施，香港沦陷后，港中行资金未受丝毫损失。抗美援朝战争伊始，为防范美方冻结港中行在美资金，他及时将存放在美国代理行的存款余额压缩到最低限度，使港中行后来被冻结的资金只有 5 万多美元。这是铁老善于根据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处理业务的又一例子。

铁老还善于从经济形势变化来窥测政治动向。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在美国还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时候，有一位英商向港中行开立一份从澳大利亚进口面粉到中国的信用证，数量很大。铁老从中分析出，这些面粉是美国通过澳大利亚转口输入中国的。当时面粉是禁运物资，既然美国允许大量面粉转口输入中国，说明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可能有新动向，于是他写了报告送内地参考。后来铁老到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问起此事，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查阅档案后认为，铁老分析正确，对铁老备加赞许，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好好学习铁老，要善于从一般业务中发现内在的更为重要的东西。

### 铁骨铮铮 急公好义

铁老人如其名，生来一副铮铮铁骨，一身都是正气。他刚正不阿，不畏强权和暴力。不管你官有多大，也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只要你错了，他就敢于批评反对。上世纪 40 年代末，当港中行在德辅道购地建楼时，有机构要求对港中行新建大楼高度作出限制，并以港英政府工务司将不予批准施工相要挟。铁老据理力争，最后由港督出面「调处」，以可以略高几尺而结束纠纷。抗美援朝期间，在港督主持欢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的宴会上，铁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义正词严地阐述了朝鲜战争的性质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

抗日战争期间，铁老领导的港中行发挥长期为爱国华侨提供汇款服务的网络优势，将海外侨胞的捐赠物资及时转交国民政府或八路军，受到时为八路军代表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联名致函表扬。港中行接受新中国领导后，铁老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知遇和信任。在处理港中行和海外其他分行的一些重要问题时，周总理经常征求铁老意见，铁老总是坦率陈言，受到周总理的重视和嘉许。

铁老铮铮铁骨、坚持原则的崇高品德，在中国银行和香港金融界可以说是闻名遐迩、有口皆碑。

同时，他对同行、好友遇到的困难，总是急公好义，全力相助，乐于替人排忧解难。香港某华资银行老板是铁老至交，在一次金融风潮中为挤提存款所困。铁老毫不犹豫地每天下午亲到该银行营业厅坐镇一个小时，以他的声望和信誉终于平息谣诼，使该银行摆脱了困境。

新中国成立前，内地银行业设在香港的十多家分支行竞争激烈。新中国成立后，关系有了很大变化，亲如一家。1951年底，港中行大楼落成。当时港中行员工不足百人，需用面积不多，而有些中资兄弟行和内地驻港机构却没有适当的办公地方而发愁。铁老急人之所急，将大楼的很大部分租给相关保险公司、贸易公司和航运公司等，既解决了兄弟单位的困难，又使大厦出现一片兴旺景象，成为祖国在香港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成为祖国欣欣向荣和团结强大的象征。

更令人感动的是，浙江兴业银行香港分行由于办公楼租期届满，而新的办公楼尚未办妥租赁手续，面临关门停业的危险。在这危急时刻，铁老毅然伸出援手，把港中行营业大厅的四分之一和部分阁楼让给浙江兴业银行当营业场所，在境外开创了一个大堂有两家银行同时营业的特例。铁老急公好义和乐于助人的事迹，在银行界传颂不已。

(载于《大公报》)